

大卫·李嘉图全集. 第6卷, 通信集.

1810年—1815年

(英) 斯拉法 (Sraffa, P.)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李嘉图全集. 第6卷, 通信集. 1810年—1815年/(英)斯拉法(Sraffa, P.)主编; 胡世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166-4

I. ①大… II. ①斯… ②胡… III. ①李嘉图, D. (1772~1823)—全集 ②李嘉图, D. (1772~1823)—书信集 IV. ①F091.3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15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卫·李嘉图全集

第6卷

通信集(1810年—1815年)

彼罗·斯拉法 主编

〔英〕

M. H. 多布 助编

胡世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66-4

2012年 月第1版 开本 × 1/32

2012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第六至九卷序

现在一起出版的这四卷李嘉图通信集,使《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序言中答应早日出版的九卷都出齐了。按比例来说,它们比以前的任何一卷都包含更多的新材料:在收入本书的 555 封信中,317 封迄未发表过。构成这本通信集的各系列信件和有关的人物,本卷卷首的介绍中都做了说明。主要对未发表过的材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查阅每卷的目录或通信者索引,凡是新信都以星号标明。^①

编者感谢已故的凯恩斯勋爵,他曾积极地参加寻觅信件,并在早期阶段审阅了这几卷的清样;感谢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和 F. A. 海克教授,他们也看过清样,并提出宝贵的意见;还感谢已故的詹姆斯·博纳博士和已故的 J. H. 霍兰德教授,他们惠允利用他们编辑的李嘉图书信集各种版本中的引言和注释。

编者还要感谢弗兰克·李嘉图先生、C. K. 穆勒先生、已故的 F. E. 凯尔恩斯先生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他们作为信件的主要收藏者,都慷慨地将信件交给编者处理;感谢约翰·默里爵士、

^① 中译本里未加星号,因为全部信件,除了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译的《马尔萨斯反动言论辑》(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中有过节译以外,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译者

兰曼夫人、埃德加·拉乌尔—杜瓦尔先生、哈里特·J. 巴特勒夫人和已故的 H. E. 巴特勒教授、尊贵的尤斯塔斯·希尔斯夫人、查恩伍德夫人和 O. E. 达维多尔·戈德斯米德中校,他们欣然提供他们拥有的成束的或单封的信件;感谢英国博物馆的保管员,伦敦大学学院、国立苏格兰图书馆、里丁大学奥弗斯通图书馆、伦敦大学
 xii 戈德史密斯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塞利格曼图书馆、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佩西亚公共图书馆、日内瓦公共及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以及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他们惠允利用他们保管的信件;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代表、美国经济学会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他们惠允重印他们以前出版过的信件。

在帮助寻找信件的人当中,编者特别感谢阿瑟·H. 科尔教授、海克教授,马格斯兄弟公司、E. 德纳莱许先生、乔治·奥布赖恩教授和 G. W. 津克先生。最后,编者必须感谢不计其数的其他人,编者在寻找李嘉图信件时曾向他们探询,虽然未获结果,他们却都曾为他费心。

彼·斯拉法

1952 年 2 月

于剑桥三一学院

通信集介绍

xiii

I. 李嘉图通信集。II. 主要通信者：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特罗尔、萨伊。III. 其他通信者：边沁、玛丽亚·埃奇沃思、格伦费尔、格罗特、霍纳、默里、普莱斯、夏普、辛克莱、图克、韦克菲尔德。IV. 本版中的书信。

I. 李嘉图通信集

李嘉图有关经济学的通信从 1810 年他 38 岁时开始，并终其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而进行写作的一生。李嘉图有四个主要通信者——詹姆斯·穆勒、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特罗尔，多年来他们同他们经常通信；而同时他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的通信则不那么频繁。非常幸运，这五系列通信中每一系列的双方信件，传到我们手里都大体上是完整的。^①

与穆勒的通信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完全是新的，而且生动地说明了李嘉图学习写作的情形和他思想的发展过程。可是，与马尔萨斯的通信在经济学上更为重要。虽然李嘉图这方面的书信

① 从现存信件的内容可以推断，散佚的信件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编者

早已为人所知,现在却补全了。这套通信具有持续讨论的特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经常冲突;关于这些书信,凯恩斯写道:“这种友谊,由于它引起了政治经济学整个发展中最重要学术性通信,而载入史册。”^①麦克库洛赫的信涉及的年代较短,它们反映出一种几乎是弟子与老师的关系,在这些信里,意见分歧只偶尔在某些点上发生;由于这些信大多数是在他们相识之前写的,因而内容着重在经济事务的探讨。最后,与特罗尔的通信显示出试图向一个比较外行的人解释李嘉图所从事的经济学讨论,特别饶有兴趣。所有这些书信,以及李嘉图与别人主要为讨论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来往的书信,都在这几卷中全文刊出。

同以前出版的通信集相反,与各个通信者来往的书信都统一按编年的顺序编排。这样,读者犹如置身于李嘉图在盖特科姆庄园的书桌旁,按李嘉图写或收到这些书信的顺序来阅读它们。另一方面,希望阅读某一系列书信的读者,可以借助于每一卷后所附的通信者索引来这样做。

书 信

年份	致 穆勒	从 1	致 马尔萨斯	从 10	致 特罗尔	从 1	致 麦克库洛赫	从 1	致 萨伊	从 1	致 其他通信者	从 2	致 全部通信者	从 15
1810		1									3		3	1
1811	2	3	7	10							4	2	13	15
1812			3	2							1		4	2
1813			6		1								7	

① “罗伯特·马尔萨斯”,载《评传集》,1933 年版,第 137 页。——编者

续表

年份	致 穆勒	从	致 马尔萨斯	从	致 特罗尔	从	致 麦克库洛赫	从	致 萨伊	从	致 其他通信者	从	致 全部通信者	从
1814		4	8	7	1	1			1		2	3	12	15
1815	5	5	19	23	2	4			2	2	1	14	29	48
1816	7	7	10	7	3	6	2	1			2	2	24	23
1817	6	4	14	5	7	7			1	2	2	2	30	20
1818	10	7	4	4	6	5	2	5			5	5	27	26
1819	5	7	2	2	7	5	6	5		1	7	5	27	25
1820	6	6	5	6	7	6	10	7	1	2	3	3	32	30
1821	7	4	7	6	7	6	8	7	1	1	4	5	34	29
1822	5		1		7	1	7	6	1	2	6	3	27	12
1823	5	1	6	3	6	4	6	4			4	1	27	13
总计	58	49	92	75	54	45	41	35	7	10	44	45	296	259
	107		167		99		76		17		89		555	

从上表可以一眼看出信件在主要通信者之间的分配和各个时期通信的次数。从表中可以注意到,在四个主要系列的每一系列中,李嘉图写的信都比写给他的信多。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即李嘉图不及他的通信者善于保存信件。但是,也可能因为他写信比较积极。例如,通信中断以后,差不多总是李嘉图先把它恢复起来(特别是与穆勒的通信)。

在将各个通信者略加说明以后,这篇介绍还要在篇末更详细地说明这些信件的编排和注释。

II. 主要通信者

詹姆斯·穆勒(1773—1836)。詹姆斯·穆勒早期著的小册子《商

业辩护论》于1808年出版,使李嘉图和穆勒第一次联系在一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这是他第一部获得声誉的著作,而他更珍视它是因为这使他第一次与大卫·李嘉图交友,这是他一生中最珍贵、最亲密的友谊。”^①可是李嘉图告诉我们,他们的亲近是由于李嘉图参加了1810年关于金银条块的论战;^②我们发现,他们在1810年底开始通信时,已很亲密。穆勒俨然以教育者自居,而李嘉图则时常感激穆勒敦促和鼓励他写作。

1802年穆勒从苏格兰来到伦敦,住在纽因顿格林,后于1814年移居威斯敏斯特的皇后广场(在那里他租了边沁的一所房子)。xvi 在伦敦,他们经常见面,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天”一起在公园里散步,^③所以那时极少写信。可是在1814年以后,李嘉图和穆勒每年都有半年(从7月到1月)不在伦敦;李嘉图去盖特科姆庄园,而穆勒及其家属则是边沁在德文郡的福德修道院(在萨默塞特的边境上,靠近查德)的客人。因此,他们的通信具有高度的季节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每年的那一时期。

穆勒从事他的《英属印度史》写作,并以投稿为生,直到1817年为止。他的朋友们都急于为他找一个可以使他有稳定收入和独立生活的正规职位。有一个时期大家想让他当筹划中的“实用知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编,第14章,第4节;阿什利版,1909年,第563页。——编者

② 1818年1月26日致特罗尔函,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七卷,第246页。——编者

③ 1818年5月25日致马尔萨斯函,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第263页。——编者

识学校”的校长,可是这个学校从未建立起来。^① 1819年,由于他的《英属印度史》问世和李嘉图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他在东印度公司得到文牍助理审查员的职位。^② 从那时起他忙于公务,同李嘉图见面往往局限于星期日。^③ 在夏季的假期里,他起先去马洛,从1822年起,去多尔金。有几次他到盖特科姆访问了李嘉图;1814年10月,他写道,和“我的全部家室之累,包括一个妻子、五个小家伙和一名女仆”^④到那里去;1818年8月他独自在那里住了十天;^⑤1820年8月和9月“住了三个多星期”;^⑥他盼望去盖特科姆度过1823年9月(李嘉图逝世的那个月)的下半月。^⑦

李嘉图与穆勒通信中的许多讨论,是他们阅读彼此的手稿而引起的。我们发现,李嘉图向穆勒报告他的工作和阅读情形,穆勒则对他的写作提出意见,对他的阅读提出建议。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中的描述中,大家熟知詹姆斯·穆勒性格较为严峻的一面,这些信却显示出他的另一面——较为和蔼的一面。

在这些信里,有几处流露出李嘉图对穆勒的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友好关注。例如,当他15岁时,李嘉图邀请他在

① 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七卷,第182页注1。——编者

② 关于穆勒职位的详细情形,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第40页注。——编者

③ 见1820年3月13日致特罗尔函,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第162页。——编者

④ 见本书第173页。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一共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编者

⑤ 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七卷,第285、292、293页注。——编者

⑥ 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第231页,并参阅第241页注。——编者

⑦ 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九卷,第329、333页。——编者

1821年夏季独自到盖特科姆去住。^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传》中述及他和李嘉图关系的段落里证实了这些:“常在父亲的书房里,我认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面容慈祥,态度和蔼,使青年人非常愿意接近他。在我成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以后,他请我到他家去,陪他一起散步,以便谈论这门学科。”^② 可是他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③ 虽然1823年9月5日李嘉图给詹姆斯·穆勒的最后一封信可以看作实际上是给约翰的,因为这封信完全讨论他所写的关于价值尺度的一篇文章。

詹姆斯·穆勒致李嘉图的信都在“李嘉图文稿”中。^④ 詹姆斯·穆勒把他收到的李嘉图的来信都仔细地装订起来,并加上提要。这些信和李嘉图逝世时送交给他的文稿(其中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和不久以前李嘉图收到的两封马尔萨斯的信及一封麦克库洛赫的信)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穆勒—李嘉图文稿”。^⑤ 这些都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他(在他生前抑或死后不详)再传给他

① 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九卷,第44、104页,并参阅第48、115页。——编者

② 《自传》,1873年版,第54页。——编者

③ 原来认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少年时候写的一张便条”,写给李嘉图的(J. H. 霍兰德编:《李嘉图短篇论文集》,1932年版,第229页),后来发现是詹姆斯·穆勒写的一封信的附言(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九卷,第331页注3)。——编者

④ 其中的两封(第413、539号信)发现较早,刊印在J. H. 霍兰德编《李嘉图短篇论文集》中,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32年版。——编者

⑤ 第370号信例外,它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边沁手稿中。——编者

的朋友——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①1943年C. K. xviii 穆勒先生在凯尔恩斯家族的财物中发现了它们，提供本版使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的总序中已谈过）。

可是，在致穆勒的这些书信被发现时，这部通信集的其余部分都已加上注释和编排成页。新发现的书信按照编年的顺序插入适当位置，并尽可能少打乱已完成的工作；特别是避免将注释从旧信转入新信，除非是必须这样做的。结果李嘉图致穆勒的信不及其余的信注得详尽；例如，1822年在国外写的第506—509号信，就没有给李嘉图遇到的人加上传记性的注释，因为注释已经加在《大陆游记》（收入《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十卷）中这些人重新出现的地方。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通信始于1811年6月，那时他们初次见面后立即各自开始给对方写信。可是马尔萨斯的信在李嘉图发出自己的信之前就已送达，因而李嘉图不得不改写自己的信。马尔萨斯的信和李嘉图信的初稿，都以极其相似的字句开始，马尔萨斯写道，“我们基本上在问题的同一边”，李嘉图写道，“对于那些原理，我们的意见是如此接近”，他们都以同样的字句说，他们应当以“私人的友好讨论”

① 李嘉图赠给詹姆斯·穆勒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版（1817）的命运也是这样，现存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书上题着“著者赠”（不是李嘉图的笔迹），还有考特尼勋爵在封里写的下列说明：“这本书由著者赠给詹姆斯·穆勒，他传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而他又给了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在后者去世时，我遵照他的临终遗嘱，从他的书中挑选了这一本。1875年7月。伦纳德·考特尼。”——编者

力求消除他们之间的几点分歧。^①

xix 他们初次见面是由于马尔萨斯的提议,也许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理查德·夏普居中介绍,在这些早期的信件里常提到他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见面的早餐席上的参加者。

他们初次见面时,李嘉图在出版物上还只是初露头角,而马尔萨斯已是众所周知的《人口论》的著者,该书初版于1798年,那时已是第四版。马尔萨斯曾在剑桥的耶稣学院受教育,1793年在该院继任大学评议员职位。威廉·弗伦德曾任他的学院导师,那年成为剑桥大学里一次风潮的中心人物,因雅各宾主义和不尊敬宗教而受攻击。^②后来马尔萨斯担任了宗教职务,并于1798年在他的故乡萨里郡的阿尔伯里任副牧师。从1806年起,并在他与李嘉图通信的整个时期里,他是设在赫特福德郡海利伯里的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那是训练为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士官生的寄宿学校。学院以学生不服管教闻名,信中常提到这种事情。教授们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校内,马尔萨斯住在学院钟楼下面的房子里。^③

李嘉图常在周末访问海利伯里,住在马尔萨斯那里,马尔萨斯也时常访问伦敦,在伦敦,他一定同李嘉图见面,有时住在他家里,

① 见本书第63、65页注①。讨论的是金银条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番马尔萨斯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出版物上的论战”。关于那个阶段,见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第10—12页。——编者

② 在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十卷里,作为李嘉图的早期相识,弗伦德还要被提到。——编者

③ F.C.丹弗斯等:《老海利伯里学院回忆录》,威斯敏斯特,1894年版,第199页。——编者

起初是在麦尔安德,后来在上布鲁克街。后来,马尔萨斯和他妻子的亲戚埃克索尔一家定期地在巴斯度假,有几次中途在格洛斯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访问了李嘉图。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书信与其他几系列书信相比,受当

xx 时事件的影响较少,更接近于系统的讨论,可是这些信涉及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整个范围,以致不能把它们按问题分类。然而在某些时期,某一个主题成为主要的讨论。因而在1811—1812年这个较早的时期,通信专门讨论通货和外汇;1815年春季密集的书信是关于地租、利润和谷物价格;1820年和1821年初夏的书信是关于经济停滞的原因和普遍过剩的可能性;1823年的最后一组书信,则是关于重新挑起的有关价值尺度的论战。

虽然马尔萨斯有一子两女,但他们都没有孩子;所以李嘉图的信传给了马尔萨斯的哥哥西德纳姆的后代。^① 他的孙子西德纳姆·马尔萨斯上校将它们交给博纳博士,以便他出初版。马尔萨斯上校的儿子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原来在萨里的阿尔伯里)将手稿供本版使用。

马尔萨斯在海利伯里的多年同事、法律教授威廉·恩普森知道李嘉图的信,并在《爱丁堡评论》1837年1月号上他写的马尔萨斯传记中摘引了许多段,这些信以《1810—1823年大卫·李嘉图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书信集》为题出版(詹姆斯·博纳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87年版)。^②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信长期没有被发现。博纳博士在他的序言中说,他请李嘉图家族的代表“去寻觅相应的马尔萨斯的信,但未成功”。这些信终于和“李嘉图文稿”一起出现了,弗兰克·李

① 另一方面,他的藏书(在传给他的儿子亨利·马尔萨斯牧师之后)传给了他的姊妹布雷夫人的后代,1949年由R. A. 布雷先生赠给剑桥的耶稣学院。——编者

② 李嘉图写的第454号信直到最近才出现,由瓦伊纳教授于1933年发表。第12、14号信以前未发表过。——编者

嘉图先生将“李嘉图文稿”供本版使用。^①

博纳的版本在确定信件日期上有许多错误；这就搅乱了李嘉图思想发展的线索，成为深入研究这一发展的障碍。第一个例子是，归入 1810 年的信，原是属于 1813 年的。^② 结果，这不但使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友谊开始的日期提前了，而且使李嘉图和润理论的形成提前了三年（这一理论是在那些信中初具轮廓的），并将直到 1813 年止李嘉图所关心的几乎完全是货币问题这一事实掩盖起来。^③ 1817 年 3 月 5 日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误定了日期，问题同样严重，在那个版本里定为 1816 年。^④ 由于这封信提到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最后一章准备付印，这一错误使这部著作似乎在事实上刚开始写的阶段就已经完成了，从而难以确定该书写作的各个阶段。另有两个次要的错误：1815 年 5 月 8 日的信在那个版本里误定为 1815 年 10 月，1817 年 4 月 3 日的信误定为 1817 年 6 月 3 日。^⑤

关于个人私事的许多简短段落，在博纳的版本里都删去了；本版中恢复了这些段落，而未特别加以说明。

① 马尔萨斯的第 62 号信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 1907 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 540 号信收在《致麦克库洛赫书信集》（1895 年版）中。——编者

② 无疑，这是因为在那些信里李嘉图的“3”字写得像一个不完整的“0”字。这些是第 39、40、41、42、43 号信。在形式上相似的是第 76 号信的日期误定为 1815 年 2 月 10 日（原为 13 日），但这并不重要。——编者

③ 参阅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第 3 页。——编者

④ 第 206 号信。这是由于原稿中的笔误。——编者

⑤ 第 96、213 号信。——编者

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1789—1864)。1816年麦克库洛赫自爱丁堡连续寄给李嘉图两本论国债的小册子,他们的联系就从那时开始。但是他们真正开始通信,是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1818年6月号上评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时候。这篇评论为李嘉图传播名声和普及他的学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
xxii 篇评论里,他显示出自己是李嘉图理论最彻底的皈依者和弟子,他成为李嘉图学说的主要捍卫者,反击对该学说的各种批评。在以后的五年内他们经常通信;但直到1823年才见面,那年五、六月间麦克库洛赫到伦敦访问六周,在那几周里,他们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麦克库洛赫的主要职务是《苏格兰人报》的职员。该报是一些革新派为反对苏格兰托利党人的统治而于1817年创办的周刊(1823年改为双周刊)。麦克库洛赫起初是投稿者,后来当了一段时期编辑。报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他写的,他常在报上刊登主要文章或占满整个第一版的“大块文章”。正如《爱丁堡评论》所说:“苏格兰只以一种独特的报纸——《苏格兰人报》而自豪,而这种报纸只以一个主题——政治经济学而自豪。这位编辑或许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之王。”^①1819年年末,李嘉图成为常年订阅者,此后对这些文章的评论是他们通信中时常讨论的主题。

李嘉图死后,麦克库洛赫被公认为李嘉图传统的主要代表者。1823年年末,李嘉图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伦敦举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来纪念他;1824年麦克库洛赫被推选为讲师。他

① “期刊”,载《爱丁堡评论》1823年5月号,第369页。这篇文章(在这几卷的注释里常引用它)被认为是威廉·黑兹利特写的。——编者

是李嘉图最著名传记的著者；1846 年成为《李嘉图著作集》的编者。

麦克库洛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集》1845 年版中(第 177—178 页),并在他编的《李嘉图著作集》1846 年版前面所加的“李嘉图生平”中(第 XXVI 页),引用了李嘉图信中的某些段落;重印在麦克库洛赫《论文集》(1859 年第 2 版,第 559 页和第 562 页)里的“李嘉图生平”中,又加引了几段;后来休·里德在麦克库洛赫编的《商业辞典》1869 年版中他写的麦克库洛赫小传里也引用了几段。

麦克库洛赫死后,这些信传给了他的遗嘱执行人,其中最后一人,他的传记作者和女婿里德,在 1894 年将它们赠给了英国博物馆,由博物馆编为 Add. MSS. 34,545 号。这些信以《1816—1823 年大卫·李嘉图致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书信集》为题发表, J. H. 霍兰德编,载《美国经济学会会刊》,第 10 卷,第 5—6 期, 1895 年 9 月和 11 月号。 xxiii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的信在“李嘉图文稿”中被发现。^① 可是麦克库洛赫的某些信(35 封中的 17 封)在弗兰克·李嘉图先生较早(1919 年)发现的一束信中,它们以《1818—1823 年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致大卫·李嘉图书信集》为题发表,作为“经济学短篇论文集重印本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J. H. 霍兰德编,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31 年版)。其余的信是在 1930 年发现的,在这里第一次发表。

哈奇斯·特罗尔(1777—1833)。与李嘉图的其他主要通信者不